

第三章 东南亚部分铁器时代遗址珠饰实地调查

三、缅甸主要遗址出土的石质珠饰特征

缅甸中北部地区位于南亚次大陆与中国华南、东南亚的关键位置上。Dussubieux 和 Pryce 使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对萨蒙河谷地区出土的玻璃及铜器进行了研究，认为萨蒙河谷地区在铁器时代的贸易网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地区在陆路上连接了印度东北部恒河河谷和东南亚的泰国乃至越南南部。^[75] Glover 指出泰国湄南河平原西侧的班东达潘遗址出土的珠饰，应该是经由陆路穿过泰国与缅甸之间的三塔关，自印度东北部以及孟加拉贸易而来。^[76] 另外，众多学者亦讨论过公元前 500 年前后至公元 300 年，印度与中国云南之间的文化传播和贸易关系。^[77] 缅甸在该陆路交流线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滇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在萨蒙河谷地区有发现^[78, 79]，典型的萨蒙河谷型红玉髓珠饰亦见于滇文化汉代墓葬中（如西汉中期石寨山 M12、M13、M6 的蚀刻红玉髓珠以及西汉中期晋宁石寨山 M1 蚀刻红玉髓珠^[80]，应属典型的萨蒙河谷型蚀刻红玉髓珠）。

（一）缅甸出土的硬石类古代珠饰时间特征

缅甸出土的硬石类珠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铜器时代晚期，目前认为缅甸最古老的红玉髓珠饰来自下 Chindwin 地区，该地区同时出土大量的圆形、椭圆形、钝三角形石（玉）环。萨蒙河谷北端的铜器时代遗址，如 Minh Oo Leh 村发现有细长棍状不透明红色硅质岩制作的珠饰、绿玉髓雕刻的大象吊坠以及贝壳片珠，该时期珠饰制作、抛光粗糙，可能使用了本地材料。^[81] 第二时期为铜器-铁器过渡时期，相当于 Bellina 等学者认为的东南亚珠饰早期阶段 (Early Period)^[82, 83]，时间上与萨蒙河谷文化接近。该时期缅甸与印度的贸易和联系更加紧密，可能源自印度的红玉髓以及黑色玉髓开始成为珠饰制作的主要材料，珠饰加工精美，造型丰富，特别是各类蚀刻珠尤其引人注目。第三时期为铁器时代晚期，相当于 Bellina 等学者认为的珠饰制作晚期。缅甸中部平原的骠文化城邦兴起，佛教和婆罗门教的传入和盛行改变了当地人的审美及葬俗，珠饰的使用和制作逐渐转为平民化与工业化，除了可能来自印度的红玉髓继续大量使用，本地的木化石成为黑色蚀刻珠制作的主要材料，该时期珠饰制作粗糙，具有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特征。

（二）缅甸出土的硬石类古代珠饰地理特征

缅甸中部平原的珠饰，特别是萨蒙河谷文化的珠饰受到印度北部、孟加拉的工艺、文化以及贸易影响，缅甸先民直接进口原产于印度北部或孟加拉的珠饰成品，并可能同时引进了印度的工艺和原材料，甚至有印度工匠亲自在缅甸本地加工极具本地特色的珠饰，并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区和文明的萨蒙河谷风格。而缅甸南部毛淡棉、直通和高登等地则直接

与南亚次大陆通过海路进行贸易，出土珠饰具有典型的海上丝绸之路风格，两种来源的珠饰风格亦在缅甸中部平原南侧的标贝、毗湿奴城等地交流碰撞，杂糅共生。

（三）缅甸中部出土的特殊珠饰讨论

1. 蚀刻红玉髓珠饰

缅甸中部平原所出土的蚀刻红玉髓珠饰具有典型的本地特色。由于东南亚的珠饰收藏热潮，绝大部分典型且精美的珠饰都为私人收藏，缅甸遗产协会负责人、缅甸古代珠饰学者 Terence Tan 编写出版了《Ancient Jewellery of Myanmar》一书，该书收录了缅甸自史前时代到骠时期的珠饰与首饰，为全面了解缅甸早期珠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图 3-51 缅甸萨蒙河谷文化特殊蚀刻珠饰和中国云南滇文化西汉中期晋宁石寨山 M1 出土珠饰
a~g. Tan 所收藏的缅甸萨蒙河谷文化特殊蚀刻珠饰
h~i. 云南滇文化西汉中期晋宁石寨山 M1 出土珠饰。其中，h 为 M1 所出铜鼓形珠，可能使用了萨蒙河谷文化三色蚀刻玉髓珠残件改制而成，i1 珠中黑色部分疑似为蚀刻工艺，相似珠饰亦见于缅甸中部，如 d 珠。i2 珠白色蚀刻环纹分为 4 组，中段 2 组分别具 3 条环纹，两端各由 2 条环纹组成，相似的排列方式主要见于缅甸，笔者认为 i2 珠很可能自萨蒙河各地区贸易而来

缅甸所出土的蚀刻红玉髓珠非常丰富，其中有两类可能是萨蒙河谷本地制作。一类呈细长棍状（图 3-51:a、c、d、e、f），所见最长的标本可达 10 多厘米，直径从 0.5~2 cm 不等。这类细长棍状红玉髓珠饰抛光精细，蚀刻形制规矩，打孔技术高超，特别是环绕珠体的白色蚀刻线环（收藏界称为“线珠”），通常以 3~5 个环为一组，根据珠体的长短不同

可具 3~6 组不等，这种设计方式与印度所出产的蚀刻红玉髓珠饰有明显区别。该类珠饰亦出土于中国云南滇文化西汉中期墓葬中。^[84] 相对的，印度所出产的蚀刻红玉髓管珠白色蚀刻线环的分布在珠体上几乎是平均的，且珠体往往呈长橄榄型，长度一般不会超过 3 cm^[85, 86]。该类蚀刻红玉髓珠饰亦见于缅甸，且数量多，如内比都国立博物馆就有收藏。该类“印度型”蚀刻红玉髓线珠亦广泛见于泰国南部遗址、越南沙莹文化遗址^[87] 以及中国广州汉墓。另一类为三色蚀刻珠，这种珠饰除在缅甸中部大量发现外，在泰国班东达潘遗址亦有出土，泰国私人收藏中亦见。^[88] 这种珠饰呈长圆筒状或倒三角形（国外学者称为“Leech bead”，即水蛭珠），相似的蚀刻工艺亦见于印度北部和尼泊尔地区的 Chong Dzi（冲系天珠）。但相对于 Chong Dzi 来说，缅甸及泰国出产的这种三色蚀刻珠颜色更为鲜艳，形制特殊，制作工艺更加精良而与印度北部和尼泊尔所见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云南滇文化晋宁石寨山 M1 西汉中期墓出土有一枚三色条纹玛瑙铜鼓形珠，极有可能由缅甸萨蒙河谷文化长筒形三色蚀刻珠残件改制而成。其他类型的蚀刻红玉髓珠饰非缅甸特有，且广泛分布于印度北部、孟加拉北部和东南亚地区，应为贸易品。

2. 黑色蚀刻珠饰

曼德勒南部的东塔曼遗址出土有数量较多的黑底白线蚀刻珠。根据 Stargardt 的记录，该类珠饰被放置在遗体胸前的位置。可惜的是，目前所见的图版仅有几枚球形黑色白线蚀刻珠（因为其外形像足球而被收藏界称为“足球珠”）。Stargardt 指出同样的珠饰亦出土于泰国的班东达潘、班清以及菲律宾。^[89] 这种球形黑白蚀刻珠多见于印度，如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的 Kakrehta 遗址中有玉髓质黑白色球珠出土。^[90] Jyotsna 指出这种图案的圆形蚀刻珠在印度北部非常常见，并认为其分布时限约为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之间。^[91] Stargardt 认为东塔曼遗址为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之间，但这个由热释光检测所取得的数据是受到质疑的，根据同时出土的器物分析，其真实年代可能晚于公元前 4 世纪。不论如何，就东塔曼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上来看，缅甸平原北部与印度北部以及孟加拉北部的交流贸易历史可能自公元前 4 世纪就已成熟。同样的珠饰亦广泛发现于缅甸中部萨蒙河谷文化遗址以及泰国中部华富里遗址，这些珠饰基本上都以细腻的玉髓制成，加工精细，蚀刻清晰。需要指出的是，标贝以南一些遗址出土有同种样式的圆形蚀刻珠，但绝大部分采用本地所出产的木化石制作，根据同时发现的马赛克玻璃珠残片来看，笔者认为木化石质地的蚀刻珠的年代要晚于萨蒙河谷时期。除了“足球珠”，其他图案的黑底白线蚀刻珠也广泛在缅甸中部发现，萨蒙河谷的其他黑色蚀刻珠亦广泛见于印度北部、孟加拉以及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处。而与“足球珠”情况相同，3 世纪以后，缅甸本地亦大量使用木化石仿制各种蚀刻珠。

3. 动物形珠 (Zoomorphic beads)

Moore 简要总结了缅甸出土的动物形珠，所见有大象、狮子、老虎、坐立的人、牛、

禽、龟、蛙以及狗等形制。^[92] Moore 指出绿色玉髓制作的大象珠是缅甸独有且最常见的动物形珠，在萨蒙河谷以及骠文化城址都有发现。在萨蒙河谷文化遗存中，动物形珠往往发现于遗体颈部处。绿色玉髓制作的大象形珠饰可能流行了非常长的时间。Moore 注意到缅甸当地珠饰挖掘者称早期墓葬中多见绿色玉髓大象珠和铜器等，尔后才开始有大量红玉髓珠饰。Ming Oo Leh 村当地人也称当年清理铜器时代墓葬的时候发现绿色大象珠及鸟形珠与典型的短棍状细小红硅质岩珠共存。陈序经转述了 Duroiselle 于 1926 年对毗湿奴城的 Khin Ba 佛塔的发掘记录如下：“……发掘出很多古物，其最显著者有：金银小佛像数尊，金指环与镶宝环多枚，空心金珠项圈一条，金叶稿本一卷，银制宰堵波模型多具，纪念钱币多枚，金银莲花多枝大者长七英寸半，金银蝴蝶多件，金银铃多枚，翠玉小象一具，宝石多种，玉髓龟一具，水晶碧玉与玻璃烧珠甚多，另有还愿牌若干……”^[93] 该记录的“翠玉小象”极有可能是绿玉髓大象形珠。Moore 亦记录有绿玉髓大象珠以及蓝色玻璃仿制的大象形珠在 Myin Mu 附近与典型的骠时期风格的银碗一起被发现。^[94] 毗湿奴城国立考古博物馆中亦展示有这种大象珠成品及半成品，据称发掘自该城内骠时期佛塔遗址中。另外，笔者在毗湿奴城附近私人收藏家处亦见到大量绿色玉髓制动物形珠与木化石质地蚀刻珠。因此，笔者认为绿色大象形珠的制作历史可能从铜器时代晚期延续到骠时期。

缅甸的另外一类特殊的动物形珠饰为虎形饰。Hudson 总结了考古发掘与民间发现的虎形饰分布^[95]，已知可靠的虎形饰皆以质量上乘的红玉髓制作，一些民间收藏的其他材质的虎形饰真伪尚存疑，红玉髓应是此类虎形饰的唯一制作材料。Glover 和 Bellina 认为此类虎形饰与泰国南部路宽把特村和 Tha Chana 发现的动物形珠类似，并进一步与越南中部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小型红玉髓制动物（狮）形饰，以及中国华南地区出土的红玉髓质地狮形饰做对比。^[96] 笔者认为，缅甸平原中部集中发现的身体细长、抛光精细、面部刻画较为简略、尾部勾起的虎形饰，很可能由缅甸中部萨蒙河谷文化制作并少量贸易到泰国中部和南部，如班东达潘和路宽把特村。而越南中部沙莹文化遗址、中国华南出土的以红玉髓质为主，并有石榴子石、水晶等制作的小型狮形饰可能与印度的联系更为紧密。Glover 等曾将缅甸中部萨蒙河谷文化的虎形饰、狮形饰（图 3-52）作为佛教思想对缅甸早期影响的证据，笔者则认为不妥。



图 3-52 缅甸中部萨蒙河谷文化的虎形饰、狮形饰^[97]

4. 缅甸国家博物馆（内比都）馆藏珠饰

缅甸国家博物馆（内比都）馆藏珠饰见图 3-53、图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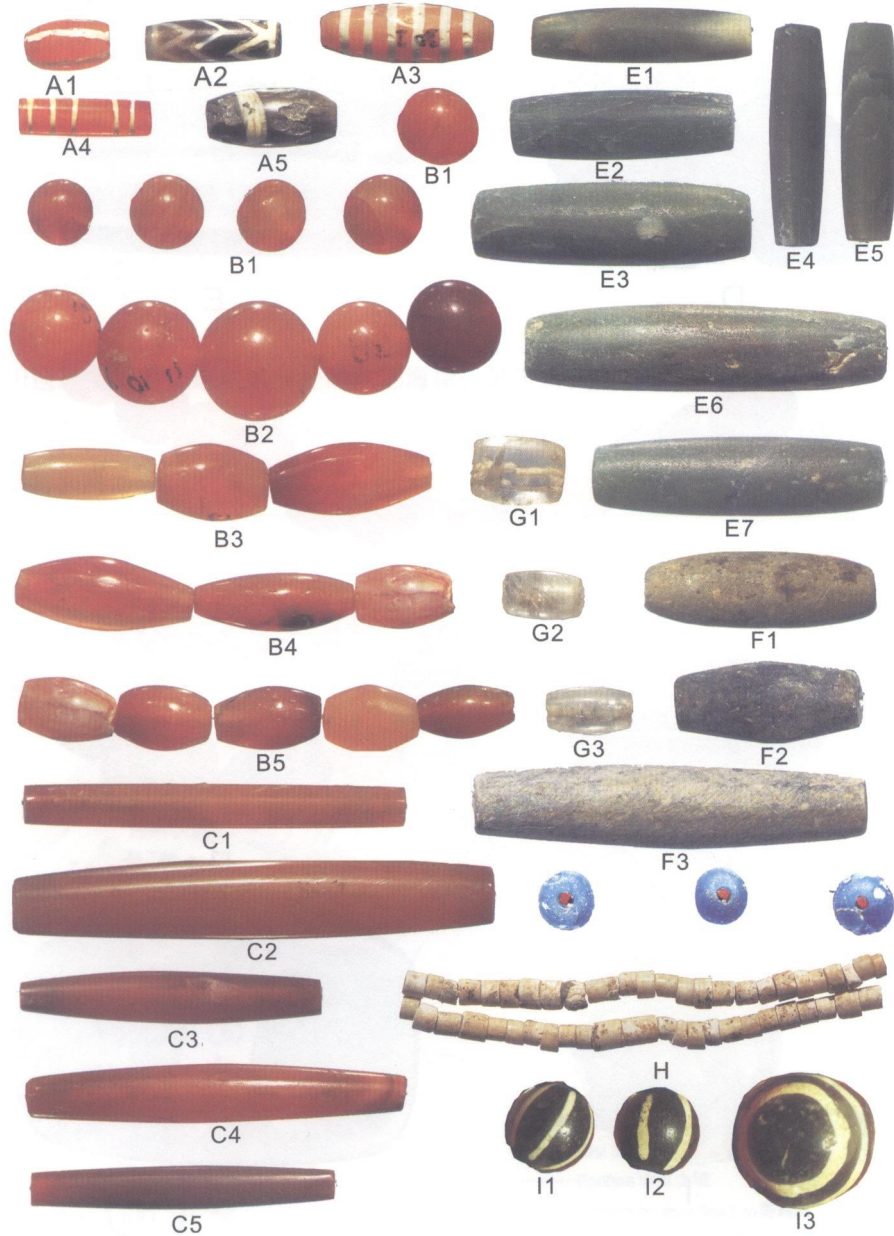


图 3-53 缅甸内比都国家博物馆所藏珠饰

A1~A5. 玉髓蚀刻珠 B1~B2. 球形红玉髓珠 B3~B5. 橄榄形截尖红玉髓珠 C1~C5. 长管型红玉髓珠
E1~E7. 长管型绿玉髓珠 F1~F3. 长管型软石珠 G1~G3. 具六棱面白水晶珠 H. 短片形贝质片珠
I1~I3. 黑色蚀刻条纹珠

A2 珠见于印度北部及孟加拉北部。A3 珠见于印度、越南中部及中国广东汉墓，应为印度贸易品。I3 珠见于缅甸中部平原如东塔曼、标贝等地萨蒙河谷文化时期墓葬，亦见于泰国北部班清、班东达潘及菲律宾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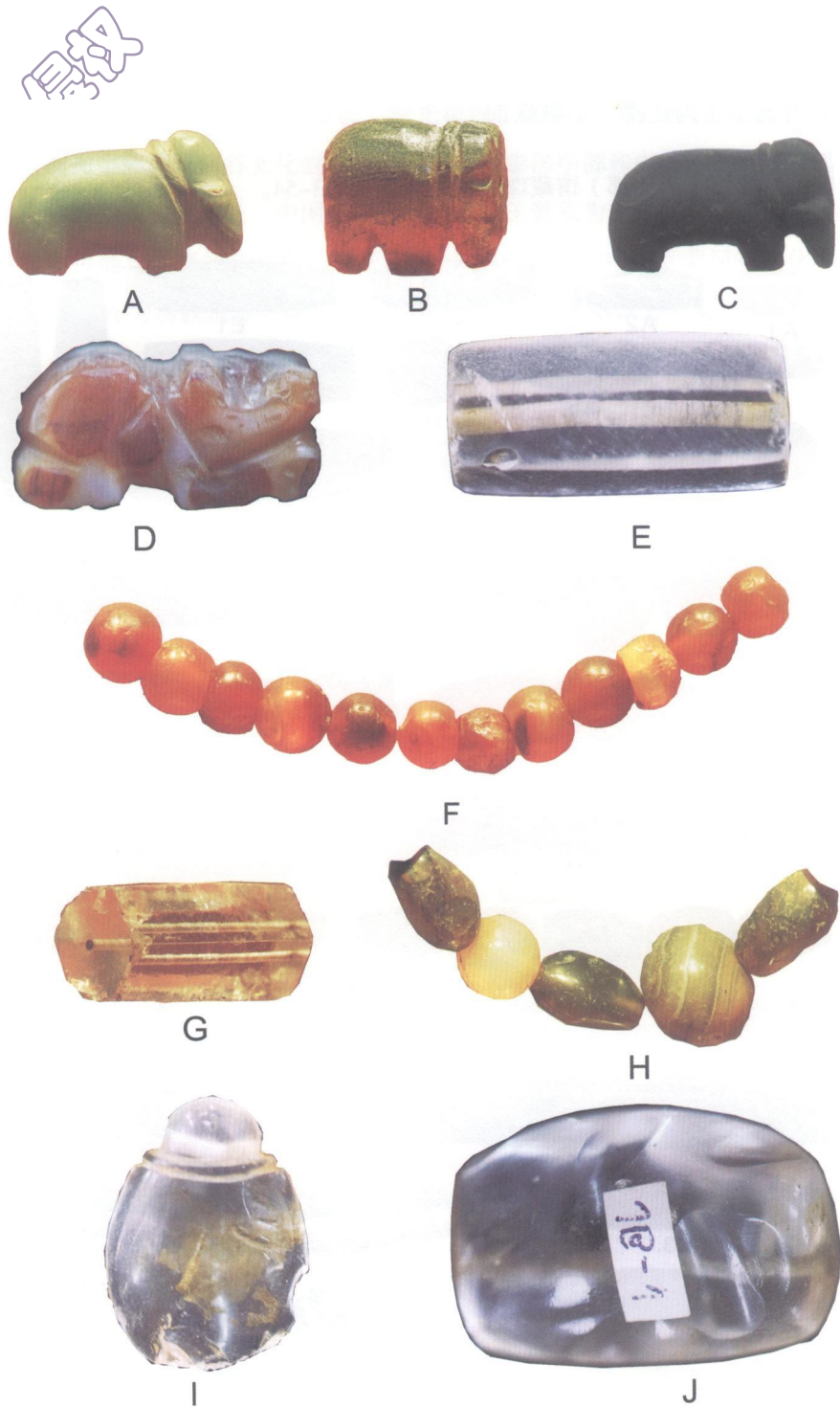


图 3-54 缅甸国立博物馆所藏珠饰

- A. 大象形绿玉髓，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民间捐赠 B. 大象形绿石质珠，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民间捐赠
C. 大象形绿玉髓珠，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来源不明
D. 兽形红玉髓饰，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来源不明 E. 白水晶六棱柱形珠，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
E. 红玉髓圆珠，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民间捐赠
F. 水晶或玻璃六棱柱形珠，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民间捐赠
G. 条纹玛瑙杂珠，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民间捐赠 I. 龟形水晶缀饰，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
J. 异形水晶珠，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